每月短篇小說評介

晦黯的、飄搖的希望

——評析黃凡的「青州車站」

•詹宏志•

篇　名：青州車站——鍾士達的一天
作　者：黃凡
字　數：二萬二千字
發表地點：短篇小說集「賴索」／黃凡著／時報出版公司印行
發表時間：六十九年六月卅日

今年六月卅日，黃凡的第一本小說集「賴索」出版；集中共收五篇小說：「最後的冬天」、「雨中之鷹」、「青州車站——鍾士達的一天」、「人人需要秦德夫」、「賴索」。

其中，「賴索」是去年時報文學獎的小說首獎作品，也因爲它，黃凡的名字得以爲人所知。「最後的冬天」發表在「中外文學」六十九年一月號，「雨中之鷹」去年十二月在「工商時報」副刊連載十餘日，「人人需要秦德夫」則發表在「現代文學」復刊號第十期。「青州車站」，是小說集出版時，唯一尚未見諸報端雜誌的短篇小說。

這本小說集，輯錄了黃凡最早的五篇小說；以一個新人的新作品而成書，黃凡這本兩百頁不到的小書，在我看，是近幾年來最出色的短篇小說集之一。五篇小說，處理五種題材，無一不是觀察入微，無一不是探討深刻，加上洗鍊的文字技巧，即使是有經驗的老作家，一書之內未必有這樣的成績。

當然，以一本小書論斷一位作家，未免言之過早，何況，書中五篇，除「賴索」之外，每一篇我都可以指出十處缺點或敗筆，顯然黃凡做爲一位小說家還有不成熟和太急切的地方。但是無論如何，這本小說集，已爲我們展現了這位年輕小說家的驚人才華和無限可能。

●歐威爾式的政治諷文

「賴索」一書中的「青州車站——鍾士達的一天」，在五篇小說中佔有獨特的地位；因爲其他四篇都是安排在臺灣現實生活中的故事，只有「青州車站」的場景是在中共大陸，這在黃凡而言應是一個全新的嚐試。

表面上看，「青州車站」是一篇描寫中共大陸下的百姓疾苦，仔細推究，其實不然。我覺得「青州車站」中的中共，無寧是一個象徵、一個預言，小說中的地點，故事全屬想像，基本上是另一篇「一九八四」。它對所有集權制度的荒謬大加嘲諷，並指出人性高貴的一面終將抬頭。

在喬治・歐威爾（George Orwell）的「一九八四」裏頭，描繪了一個由老大哥（Big Brother）所控管的集體制度負烏托邦（totalitarian auti-Utopia），在那裏，即使是私人的情感與內心的思

想，都逃不掉國家權威的控制。小說中充滿了尖銳的諷刺，譬如故事主角溫士頓・史密斯（Winston Smith），在黨裏頭的「眞理部」（Ministry of Truth）幹一名小職員，專司僞造檔案、文件，眞理淪爲謊言，沒有比這更令人驚異了。

和「一九八四」一樣，「青州車站」也是一篇政治諷文（political satire），文中充滿了謹愼的言不由衷和驚人的荒謬的描寫。故事主角鍾士達，是一位已入中年的黨裏頭小幹部，參加過韓戰，現在任職於人民商店，「青州車站」寫他一天慣常的生活，當然有一些事件的發生，但也沒有驚人的事，那是每天都可能發生的。「青州車站」副題「鍾士達的一天」，很有索忍尼辛「伊凡・丹尼索維奇生命中的一天」（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uich）的味道，故事的安排也不無可比較之處，然而「伊凡・丹尼索維奇生命中的一天」是具體的寫實，「鍾士達的一天」却是另一種社會制度的想像，使兩者的功能大異其趣，索氏作品毋寧是一種控訴，黃凡的作品却是寓言。

拿「青州車站」和陳若曦描寫文革時期中共大陸的作品相較，就可看出這一層不同。「青州車站」中的場景、人物洋溢着眞實感，然而這眞實感與陳若曦文字比較，就可發現並非今日中共大陸的絕對寫眞，而是作者以其想像力創造出的眞實感，它並不存在眞實世界的那個地方，只存在於小說之中。小說中的「青州」只對映於我們心中的某種類型，不能對映於世界地理上的明確位置。

・極權世界的文學警告

「在太平時代，我本可以寫些華麗的或應景敍事的文章……也可能至今完全不知道我自己的政治立場。我已被時勢所迫，變成了某種寫小册的作家……自一九三六年以來，凡我所發表過的，討論嚴重問題的作品，每一字一句無不是直接或間接反抗極權主義，擁護民主的社會主義。如果有人認爲，生在我這個時代，可以避免涉獵這些問題，在我看來是荒謬的想法。」——喬治・歐威爾（「我爲何要寫作」，一九四七）

歐威爾的寫作歷經兩次世界大戰，使他的作品蒙

上陰暗悲觀的色彩；而他目睹一次大戰後，世界上出現一種以「社會主義」爲名的極權政治，使他不得不訴諸文學，以警告世人。

歐威爾警告世人當心極權政治的興趣，乃有兩部震驚文壇的巨作，一是「動物農莊」（Animal Farm），一就是「一九八四」，竭力批判史達林式的高壓恐怖極權制度。

「動物農莊」中動物革命，選擇了才智最高的豬來代替主人管理農莊，豈料豬的品性更爲自私狡詐，使畜牲們受到更大的欺騙、凶殘、和奴役。這個童話式的社會寓言，强烈的諷諭一九一九的蘇俄大革命，雖然以崇高的理想和希望爲始，却以另一種暴虐統治爲終。

「一九八四」的批判則更爲强烈，它構建一個假想的極權國家在西元一九八四年的情形，在那裏，推動社會的動力是仇恨和恐懼，生存在社會裏的一般人永遠受到監視，情感、思想都極權政府的管制。

黃凡的「青州車站」，在內容上則完全近於「一九八四」，藉一個極權政治社會下的小人物生活的描寫，暗示這個制度對人性的扭曲，帶來的恐懼與悲慘。「青州車站」不指明時間，使人覺得是現在，比起「一九八四」更具壓迫感（「一九八四」在一九四九年出版時，小說時間還早卅五年，人們便把它當科幻小說看待）。「青州車站」藉青州一個虛構的地方，把它放在中共社會的北方小城，構建一個適合情節發展的地理環境。

「青州車站」中的男主角鍾士達，較之「一九八四」的溫士頓，更爲世故認命。在「一九八四」裏頭，溫士頓還冒着生命危險記私人日記，心中還抗拒著「黨」的統治和主義；然而，鍾士達不，他完全接受，包括他個人的生活與命運，包括他死於韓戰的大哥，包括他被送往東北的兒子。鍾士達比溫士頓更像一個極權政治教育統治下的小百姓，他毫無反抗，即使有怨言，也無力對抗那龐大權威，無所不在的控制力量。

爲了描繪極權社會那種無孔不入的控制，「一九八四」創造了一種「電視幕」的裝置，這種裝置設在每一個家庭的每一間房裏，包括廁所、盥洗室在內，永遠無法關掉。它同時兼有收發的作用，一方面向你交待每一件事，包括起床與晨操，另一方面監視着你

，一舉一動都被注視着，比耳語稍高的聲音都會被電視幕收進去。

這種近似科幻機關的電視幕，到了黃凡的「青州車站」，成爲揮之不去的麥克風聲音：

「同志們，早！」

「讓我們以歡欣的心情，來迎接這一天的開始。」麥克風繼續說，它叫你起床，要你工作，告訴你必須感激誰，最後當你渴望睡眠時，在你耳邊大聲說，你應該覺得驕傲。

西伯利亞寒流徊徘不去的時候，麥克風暗示說，這是「蘇修」搞的把戲。走在大馬路的時候，麥克風說：「我們最敬愛的主席同志，您是全人類的救星，世界的偉人，東方的太陽……。」

「青州車站」中，對麥克風不間斷的穿插描寫，暗示這種持續的口語洗腦，已成爲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。

麥克風與電視幕的對照，足以讓我們意識到，「青州車站」不是一篇中共大陸百姓生活的描寫，也不只是中共政權的批判，基本上，它是一篇更寫實，更接近中國人的「一九八四」，同爲極權政治的文學警告。在這裏，中共被擴張成以社會主義爲面具的極權統治之表徵，它當然在被批判之列，但不是批判的唯一對象。也因此，「青州車站」不是對某一社會事實具體的指控，而是一個特定政治觀念實質的撻伐。

●黑暗世界的真實想像

「溫士頓轉過身來，面上裝着非常快樂的表情。對着電視幕，非裝着這假面貌不可。」

「電視幕的力量尚未能控制寢室，因此他故意把書架放在這裏。溫士頓愼重地以背向着電視幕坐下，以躲避它的窺探。雖然他的聲音仍免不了被電視幕收聽，但至少所坐的位子可以隱蔽。」

在「一九八四」裏，這一段文字確實道盡了極權統制下的人民精神苦楚，人們爲求生存，不得不在控制力量面前謙卑謹愼，在個人的心中則另有想法。這種極權政治下的人格分裂，乃是一個普遍現象，其結果是「作僞流行，人格掃地，精神頹喪」（殷海光先生語）。

歐威爾另有一段描寫自我保護的作僞行爲：

「我問你，你有剃刀片剩餘嗎？」他說。

「一片也沒有了。」溫士頓急促地撒謊說：「我已找遍各處，一片也找不到。」

每一個人都免不了問人家要刀片。實際上溫士頓還有二片新的。最近幾個月來，刀片已成奇貨可居。任何時候，黨營商店總有某一些日常必需品無法供應，有時沒有鈕扣，有時沒有毛線，有時鞋帶缺貨，現在刀片又成問題。

「我現在那一張刀片已用了六個星期了。」他不老實地加了一句。

在「青州車站」裏頭，作僞和言不由衷，也成爲人們生活一種反射性的動作：

「今早又有一班往北的囚車。」

「黑龍江，或者那裏，誰知道，」組長說，他是個老人，皺紋使他的兩眼緊靠一起。前些時候，有屍體從車上抬下來，沿着鐵軌，排成一列。「你在東北的兒子怎樣了？」

「還好，」鍾士達說，「國家需要他，這是他的光榮。」

「好，」老人說，「好。」

他們彼此審愼地打量了對方一眼，老人笑了一下，他知道怎樣開始，怎樣結束，他够老了。

另有一段，描寫社區黨部的小組會議討論，更尖銳地諷刺了是非對錯全看時宜：

「走資派敗壞了黨的純潔道德……。」

鍾士達拿起來，在上面添了一些字。

「黨的一小撮。」

這樣修改好多了。究竟有多少走資派，他也弄不清楚，不過一定不能太多。

在「青州車站」裏，鍾士達不知道實際有多少走資派，但他知道（按過去經驗）一定不能（說）太多。這種時候，眞理或事實變得毫不重要，問題在你如何使用才不會出錯。在「一九八四」裏，政府分成四個部門：眞理部、和平部、博愛部、財務部。其中眞理部所司的，是新聞、藝術與教育。在極權地區，「眞理」被集中於政府及黨派手中，如同財富集中於政府一樣；同時，政府也操有「製造眞理」之專利，任何人不能表示反對言論以與政府爭眞理，就如財產不能私有一般。

「青州車站」更進一步，藉許多情節烘托極權政治底下的人性扭曲，與社會的荒謬。譬如市場經濟被

禁絕的社會裏，由於欲望的交替需求，便產生了黑市；在青州，這樣的黑市可能發生在個人之間：

鍾士達走進成堆的蘿筐和板車之間。車站管理員這當兒伸長了脖子東張西望，他的視線掠過遠遠站在一邊搓着雙手的公安人員，再回到鍾士達的臉上。

「這個怎麼樣？」鍾士達從蘿筐裏拿出一個肥大的蘿蔔。

「不錯，不過蕃茄……。」車站管理員喃喃地說，他一直想弄幾個蕃茄。

「蕃茄，沒有辦法，」鍾士達滿懷歉意地說，「你知道書記員同志的脾氣。」

他們都認識書記員同志，他經過痛苦的韓戰和漫長的越戰，戰爭將他的脾氣磨得像子彈一樣銳利。

「好吧！這個給你。」管理員摸着大口袋，另一手接過那個大蘿蔔。

「兩張『永恒的人民英雄』，」鍾士達有些洩氣的說，「我寧願要『都市的工人模範』。」

「沒辦法，」管理員說，「一個蘿蔔。」

「青州車站」裏的黑市交易，不僅於一個蘿蔔換兩張電影票，還有嫖妓的討價還價，還有大場面的黑市市集。在一週一次的市集裏，人潮摩肩接踵，人人高聲叫賣，猶如臺灣的夜市，場面是很驚人的；然而交易的基礎還是以物易物，一個蘿蔔換一個墜子、一把扇子之類的交換，絡繹不絕。

然而，論描寫之生動，構想之精彩的黑市交易，還是鍾士達到廢棄的寺廟嫖妓（多大的諷刺！）的討價還價：

「同志，」公安人員：「拿來。」

「這個給你。」鍾士達掏出一張「永恒的人民英雄。

「不够。」公安人員搖搖頭。

「但是上個星期？」

「那是上個星期的價格，市場每天都在變動，」他開始不耐煩起來，「你懂不懂？這個星期要一張『都市的工人模範』，不然就是四毛錢，」

「這一張再給你。」

「找你一張『金沙江之戀』。」公安人員從口袋裏掏出一大堆電影票。

「我不要那個，你找我三毛錢好了。」

「不行，我沒有拿錢出來的道理。」

「還我，」鍾士達在心裏咒罵了一聲，「我給你一毛錢。」

「兩毛。」公安人員陰險地笑了一聲。

「你這是什麼算法？一張『永恒的人民英雄』還要兩毛，你這是什麼算法？」

「社會主義的算法，笨蛋！你到底想不想進去？」

「好吧！」

黃凡在「青州車站」裏，爲死寂的瘋狂世界寫下眞實畫面；在描寫鍾士達嫖妓時的討價還價，黃凡已經露了一手「創造荒謬情節，表現人性眞實」的才華。平心而論，這一部分能力，他甚至在歐威爾之上。「青州車站」中有一段描寫怠工的工人偷懶時的貧嘴抬槓，內容荒謬，却側面擊中那個場景的心理環境。文字非常精彩，抄錄如后：

「又在看你的老相好？」

「沒這回事。」站在窗口的人說。

「那你在看什麼？」

窗外排着一條長隊伍，有套着頭巾的老婦和拉着她們衣角的小孩，和一些蒼白，睡眼惺忪的年輕女人，當中的一個側着臉，用悲哀、無神的眼光注視着玻璃窗。這一個工人認得她，每天一清早，她就來排隊，因爲在那場大風雪中，她來晚了，沒有帶回去任何衣物，第二天，她的小孩就死了，此後，彷彿受着內心某種力量的驅使，天還沒亮，她就等在那裏。

「你到底在看什麼？」大個子工人又問了一句，他找不到別的話題。

「他在看天空的飛鳥。」坐在他身邊的工人回答。

「鳥都凍死了。」

「他在看樹木。」第三個人說。

「樹木都砍去當柴火。」大個子回答。

「他在看房子。」

「房子都燒光了。」

其他人都提起了興趣，站在窗口的工人也轉過身，瞧着他們。

「他在看你妹妹。」

「我妹妹嫁到貴州去了。」

「他在看你老婆。」

「我老婆還沒批准下來。」

工人的聲音越來越大，眼神越發空洞、迷惘。站在窗口的這個人老問他們，拿不定主意究竟加入那一邊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鍾士達推開門走了進來。

「他在看你爸爸。」

「我爸爸在勞改營裏。」

「他在看你媽。」

「我媽在墳墓裏。」

問題越來越離譜，越來越荒謬。

「他在看他自己。」

大個子工人想了一下說：

「要有鏡子才行。」

「他在看樣板戲。」

「要有錢才行。」

「他在看毛語錄。」站在門邊的鍾士達忍不住插了嘴。

「要有……。」

大個子猛然住了口，所有的人一齊回過頭，瞪着鍾士達。

這場「山歌對唱」般的鬪嘴，全然不提一個反對極權的字眼，但文字造成的衝擊效果何等强烈，這正是黃凡最高明處。

•易碎的古瓷花瓶

黃凡對想像中極權世界的描寫，在我看來，眞實、合理，不算太誇張。我浪費前述的諸多文字，無非是比較並證明，「青州車站」並不是一篇寫實作品，而是一篇社會寓言；它與歐威爾的「一九八四」一樣，都是反對集權社會的文學警告。

然而，集權政治是否將如「一九八四」所預言，席捲整個人類世界？這倒不是可以隨意推揣而得的。但是，集權政治以後呢？人類將永受拑制，不得翻身，還是有機會再起義軍，重見光明？

在「一九八四」文中，答案是如此悲觀，溫士頓接受折磨與洗腦之後，「一切都已勝利，這場鬪爭已告結束。他已戰勝了自己。他愛老大哥了。」

在「青州車站」中，鍾士達比溫士頓更爲窩囊，他甚至不會起任何反抗的念頭，溫士頓那種干法犯紀的衝動是鍾士達絕對不會有的，所謂的「鬪爭」根本不曾發生。鍾士達至多在「沉默地帶」憶起卅年前的公園、狗、和年輕；或者在看到木頭模特兒時，想起

如夢的舊日上海。至多如此，這是中國人的方式。

但是黃凡却有樂觀的看法，小說最前面，他以「只要有人類就有希望」，又以鍾士達大發善心買下小女孩無用的清瓷花瓶，認爲「也許來春路邊會長出一些小野花，紫色、紅色、黃色，五顏六色的小花朵。」

這種對人性的樂觀，與全文陰沉鬱重的氣氛太不相同，突其而來的光明尾巴，令人感到驚愕。

至少我個人，絕不敢如此樂觀，以爲一個人乍現的良心足以對抗一個佈滿麥克風的組織。「暴政必亡」只是一種期望和信仰，在現代化的組織制度與管理武器，媒體獨佔與洗腦教育，我眞不知道人類憑什麼有單獨對抗的希望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人類全體進入了一九八四的美麗新世界，縱有一百個溫士頓（更不要提認命無違的鍾士達），也不能再翻身。

鍾士達向哭泣的小女孩買下一隻小小的古瓷花瓶，這種希望是無力的、易碎的；也許來春路邊會長出一些小野花，這種希望在雪地嚴寒的青州，是晦暗的、飄搖的。